

切韻音系聲母的內部構擬**

洪 惟 仁*

摘 要

本文認為《切韻》是整合六朝時代(約三至六世紀之間)漢語方言的「通變系統」，《韻鏡》以表格呈現為有條理的系統。本文運用互補分布關係的「空音填補」將此「通變系統」整理為 26 個聲母，並利用「意涵普遍性」原理擬訂其音讀。本文認為此反映「前中古」時代的聲母系統。

關鍵詞：切韻音系、韻鏡、通變系統、內部構擬、意涵普遍性、前中古音

一、前言：《切韻》的性質及等第開合之解釋

在漢語文獻史上，有兩本研究漢字音的經典作品，就是《切韻》與《韻鏡》。前者提供了中古漢語的「通變系統」，後者將其音系作了系統的歸類。本文擬根據這兩部文獻為前中古的聲母系統進行「內部構擬」。

2014 年 4 月 6 日收稿，2015 年 1 月 15 日修訂完成，2015 年 7 月 16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退休教授。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05 年 5 月 14-15 日靜宜大學中文系舉辦的「廿三屆聲韻學研討會」，承蒙與會學者討論指正，受益良多，尤以龔煌城老師賜教最多，謹此致謝。修改版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指教，又蒙丁邦新教授、何大安教授、高晶一教授、程俊源教授指正或校正，庶幾避免了許多錯誤或疏失，尤以丁老師賜教最多，在此一併致謝。其餘未能及時修正的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一)《切韻》的通變性質

1. Weinreich 的「通變系統」(diasystem)

Weinreich (1954) 根據對應關係提出一個方言比較的模式。原文為 Yiddish 的例子，為便於了解，替換成閩南語方言的例如下（引自洪惟仁 2003: 21）。

我們以閩南語央高元音韻類為例，這個變項有四個字類：

- a. 〈基居〉類：漳泉方言都唸 i。如基、義、而、備……。
- b. 〈珠舡〉類：漳泉方言都唸 u。如臼、舊、主、住、殊、有、霧……。
- c. 〈居居〉類：龍溪漳音 i，泉州 i，惠安 i，廈門 u。如去、魚、豬、佇……。
- d. 〈居舡〉類：龍溪漳音 u，泉州 i，惠安 i，廈門 u。如自、思、史、事……。

上表韻類名稱首字指《彙音妙悟》之字母（韻母），次字表《雅俗通十五音》之字母，其下例字為以上兩本韻書共同收入的字。方言的對應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一 閩南語央元音字類的音韻對應

	基居	居居	居舡	珠舡
龍溪	i	i	u	u
泉州	i	i	i	u
晉江	i	i	i	u
廈門	i	u	u	u
字例	卑刺四基	女居舉虛	子此思師	夫父主注
中古音	止開三	遇開三	止開三 <small>莊精文</small>	遇合三

如上表所示四個方言四個字類中，兩個字類有一致性，兩個字類有差異性。方言異同的對應關係可以運用 Weinreich 的圖式 (scheme) 改寫如下：

表二 閩南語字音通變系統

龍、泉、晉、廈	<table style="border-collapse: collapse; width: 100%;"> <tr> <td style="padding: 2px 5px;">龍溪</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i</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u</td> </tr> <tr> <td style="padding: 2px 5px;">i ≈ 泉州</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i</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i</td> </tr> <tr> <td style="padding: 2px 5px;">晉江</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i</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i</td> </tr> <tr> <td style="padding: 2px 5px;">廈門</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u</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td> <td style="padding: 2px 5px;">u</td> </tr> </table>	龍溪	i	~	u	i ≈ 泉州	i	~	i	晉江	i	~	i	廈門	u	~	u	≈ u	
龍溪	i	~	u																
i ≈ 泉州	i	~	i																
晉江	i	~	i																
廈門	u	~	u																

他把這個圖式叫做「通變系統」(diasystem)，其實就是一種共時的方言的對應關係。在歷史語言學，這種比較方法並不新鮮，但在結構主義的理論架構裡，每個方言的結構都是獨立的，不求比較與對應(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35)。Weinreich 的貢獻是把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應用到共時的方言研究，並且加以模式化，使得方言的對應系統變得容易理解、掌握。

2. 陸法言的《切韻》

其實，中國的音韻學家對於「通變系統」的研究早在隋代陸法言著作《切韻》(601)的時候就已經做得很成熟了。當時的漢語已經有好幾種韻書，記錄了不同方言的漢字音。隋開皇初有劉臻等八個人在一起討論漢字音讀問題，覺得諸家分韻這麼分歧，需要一本可以包容南北方言分韻的抽象韻書，其目的就是《切韻》〈序〉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簡單說，就是希望編一本通用的韻書，只要根據這本韻書作詩，不論是哪個地方的人唸起來都押韻。於是確立了打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摺選精切，除削疏緩」¹的大原則。所謂「除削疏緩」的意思是說：甲韻書合韻(疏緩)，而乙韻書卻分韻(精切)時，從乙分爲二韻；甲韻書分韻(精切)，而乙韻書卻合韻(疏緩)時，從甲分爲二韻，也就是「從分不從合」的原則。他把所有古今、南北方言能夠分韻的都照這個原則儘量分開，編成《切韻》這本韻書。

這本爲了押韻編成的韻書無意間把共時方言抽象化，把歷時變化壓縮到一個共時的平面，爲中古音整理出一個「通變系統」，也就是所謂的「切韻音

1 依丁邦新(1995)分析，參與討論切韻的八人之中有三人代表金陵(江南)、五人代表鄴下(洛陽)，故曰「南北是非」，當時可考的漢字音文獻自後漢(許慎《說文解字》)、魏(李登《聲類》)至晉(呂靜《韻集》)等……故曰「古今通塞」(據周祖謨 1966)。總之是折衷魏晉南北朝時代所見韻書編成的。

系」。這實在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成就。

《切韻》是中國式的 *diasystem*，它把六朝時代（魏晉南北朝，約三至六世紀之間）至隋約四百年間漢字的古今方言對應關係整理得有條不紊，通行中國一千四百年。即使到了今天《切韻》還可在相當程度內涵蓋並解釋現代漢字音的變異，同時提供了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的堅實基礎。因此成為研究歷代漢字音比較的座標，是上溯上古音，下巡中古至近、現代漢語演變分化的交點。

《韻鏡》是另一部偉大的作品，這本韻圖所以偉大乃因作者採用了歸納法整理《切韻》的音韻系統，製作成表，後人又整理出「三十六字母」表附之，對各聲母的語音進行簡單的解讀與歸類，有畫龍點睛之效。其歸納方法提供了一個統理繁雜音系的方法，為後世「同音字表」的濫觴。

（二）《韻鏡》的音系整理

《韻鏡》相傳是唐末梵僧所著。² 其成就及性質可以分為以下幾點說明：

1. 四聲同表以明聲調與韻母系統之關係
2. 以開、合、四等確定韻類區別
3. 今本附註五音清濁，確定聲母音讀

《切韻》所做的是音類分析的工作，顯得雜亂，《韻鏡》進一步編成同音字表，把叫人眼花撩亂的繁多音類整理成眉目清晰、簡潔明瞭的音韻系統，整體成就令人讚嘆。

但《韻鏡》為了節省篇幅，節省紙張，把韻母等第移來移去，甚至把不同「聲」、不同「轉」的字也移來移去，雖然其移動都是有道理的，但其道理相當複雜，表面看來卻似「混亂」，一般讀者視為天書，即連音韻學家用盡心

2 張麟之《韻鏡》〈序〉：「往昔相傳……釋子之所撰也。有沙門神珙號知音韻，嘗著《切韻圖》，載《玉篇》卷末，竊意是書作於此僧。」（龍宇純 1964: 19）施向東（2013: 65）指出今本《玉篇》卷末所附釋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是《韻鏡》之濫觴，文中有提到《元和韻譜》，因此推斷著於元和（806-820）之後，但必與唐末守溫同時，不可能晚至北宋。《韻鏡》原著《反紐圖》歷代不斷被傳抄、改編、重編為相類的韻圖，並命以新名，如鄭樵《七音韻鑑》，內容相近，都是按己意重編之作。但其原著當出於唐末梵僧無疑。印度「悉曇章」就是一種單音節字表，梵僧模倣「悉曇章」把梵文換上漢字創造了等韻圖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思，也不太了解其中奧妙。

據考證，《切韻》原書分韻 193，後來改編的版本，分韻越細，王仁煦《刊謬補闕切韻》增為 195 韻，孫愐《唐韻》開元本分 193 韻，天寶本增為 202 韻，《大宋重修廣韻》再增至 206 韻。但董同龢說「不過是分韻寬嚴的問題，並非系統上有什麼歧異。」（董同龢 1954: 42）

《韻鏡》把實際上具有互補關係的聲母、韻母整理成簡潔的音系，超脫了分韻寬嚴的問題，在音位學上有極高的價值。但要了解《韻鏡》的音系結構，首先要釐清哪些是有價值的音韻區別，哪些只是為了節省紙面造成的「雜亂」。

《韻鏡》因為表面的複雜、雜亂，其音韻系統沒有被充分的解讀，其價值也沒有受到充分的認識。

二十世紀以來，由於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的發達，《韻鏡》及後來的韻書所呈現的開合、等第有比較清楚的認識與合理的解釋，因而也更加了解《韻鏡》的價值。本研究是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重新歸納《韻鏡》所呈現的切韻音系聲母系統，並進行擬音。下面就過去的研究成果做一個簡單的回顧與評斷，做為本文展開切韻音系內部構擬的基礎。

1. 《韻鏡》與「三十六字母」

今本《韻鏡》〈韻鏡指微〉附了一個「三十六字母」表，將聲母發音部位分為七類，即所謂「七音」，³其中有三音，各細分為二類，即「唇音」分「唇音重」、「唇音輕」二類；「舌音」分「舌頭音」、「舌上音」二類；「齒音」分「齒頭音」、「正齒音」二類。不過近人發現的唐寫本《守溫韻學殘卷》〈歸三十字母例〉顯示守溫訂的字母原來只有三十個，唇音只有一套，無所謂輕重之分，又泥、娘不分，禪、牀不分（董同龢 1965: 114）。

不論是「三十字母」或「三十六字母」都只是通俗的歸類，和《韻鏡》嚴整的系統不完全對應。《韻鏡》的聲母只分「七音」，無所謂「字母」，哪一個字屬於哪一類字母，並沒有明確的標示。後人說三等合口的是輕唇音，其餘為重唇音。但所謂輕、重唇在《韻鏡》是不分的（詳（四）「有關*w 介音」）。

3 傳統音韻學家將發音部位分為唇音、舌音、牙音、齒音、喉音，合稱「五音」，附會音樂上的宮、商、角、徵、羽；另舌音清濁的〈來〉母附會「半徵」，齒音清濁的〈日〉母附會「半商」，總稱「七音」。

相對的，「舌音」分「舌頭音」、「舌上音」，「齒音」分「齒頭音」、「正齒音」，系統比較清楚。但「三十六字母」混同了莊、章系，陳澧利用系聯方法才證明兩套聲母的分別，又喻母也分為兩類。其實《韻鏡》系統原本分明，比後人所謂「三十六字母」、守溫「三十字母」精密得多。

由此可見所謂「三十六字母」是後人增修的，而且為通俗性需要所附，非原書本有。不過這個表對所擬字母（聲母）的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有清楚的描寫，這是應該肯定的。

既然「三十字母」或「三十六字母」都只是通俗的歸類，那麼切韻音系真正的聲母系統到底如何？這不得不從《韻鏡》所根據的《切韻》去求證。陳澧是第一個悟到可以利用切語去歸納《廣韻》聲母的音韻學家，其名著《切韻考》採用的方法有「基本系聯條例」以歸納相同的聲母；「分析條例」以排除不同的聲母；另外還有利用一字二音一般只是聲調不同的原理以為「補充條例」，一一系聯，歸納出 40 類聲母，他自稱是「惟以考據為準，不以口耳為憑」。

可是不論《切韻》或《廣韻》都不是一時一地之方言，也不是一人之作。切語的創作原則並不一致。通常聲母、韻母同時考慮介音，但是有時介音只見上字，有些介音只見下字，即後人所謂「類隔切」。⁴ 他的系聯根據的是《廣韻》，不是《切韻》原本。《廣韻》有些是後人增補的，有些歸類或切語可能不適當（詳參藤堂明保 1979: 141-142）。可見純粹根據考據，實際上得不到

4 所謂「類隔切」指的是以後人音感，認為切韻反切上字有輕唇、重唇字母互用，舌頭與舌上字母互用的混亂現象。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1799）卷 5 專談韻書，提出「古無輕唇音」、「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的主張，受到後人頻繁引用。他說：「《廣韻》每卷之後附出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上平聲八字，下平聲六字，上聲五字，去聲二字，不知何人所附。古人製反切皆取音和，如方、府、甫、武、符等古人皆讀重唇，後儒不識古音，謂之類隔，非古人意也。依今音改用重唇音出切，意在便於初學，未為不可，但每韻類隔之音甚多，僅改此二十餘字，其餘置之不論，既昧於古音，而於今音亦無當矣。」這段話有兩個重點值得注意：1. 他採用的證據主要是廣韻的切語，2. 他是第一個發現諧聲字及切韻的聲母系統中沒有輕、重唇對立，沒有舌頭、舌上對立的學者。他指的不但是上古音，也是中古音的現象，後人卻引用他的話來指證「上古音」，而非切韻音系。很多音韻學家擬訂的中古音仍然是輕、重唇對立，舌頭與舌上對立的系統。這實在是令人費解的偏頗。

科學的結果，這是反切的本質及韻書背景本身的限制，不是歸納方法可以解決的（董同龢 1954: 51）。

但《切韻考》的成就在於釐清「三十六字母」混淆了的切韻聲母系統，把四個「莊系」（莊、初、牀、疏）聲母（相當於《韻鏡》的照_二）從「照系」（相當於《韻鏡》的照_三）中分出來，又把「喻」母分爲二類：「喻」（相當於《韻鏡》喻_四）及「于」（相當於《韻鏡》喻_三）。陳澧《切韻考》只不過重新整理切韻音系，並沒有超出《韻鏡》的成就。

近人曾運乾順著越分越細的趨勢，把所有聲母都分爲三等與非三等兩類，共得 51 類（陸志韋 1939，董同龢 1954、1965 皆肯定他的分類）。不過其中大部分是根據三等分立。如果我們把介音-j-看成是獨立的音位，三等聲母和非三等聲母具有互補分佈關係，從音位學的觀點看，三等聲母不應該獨立成一類聲母。

本文走的是相反的路線，運用音位學原理及內部構擬法重新歸納《韻鏡》的聲母系統，合併一些互補分布的聲母，發現《韻鏡》沒有 30 或 36 字母，也沒有 40 或 42 字母，更沒有 51 類聲母，只有 26 個聲母。

2. 《韻鏡》的四欄五等韻

《韻鏡》按聲調的不同分四欄編成同音字表，橫格代表平、上、去、入四聲；每欄又分四等，分列音讀相近的韻母。但聲母只分唇音、舌音、牙音、齒音、喉音（所謂五音），半舌、半齒合爲一欄，共六個縱欄，每欄收不同聲母的字，依序羅列。

問題在「五音」內的聲母。同欄的三等有時是有兩、三套聲母的，但表中三等只有一列，怎麼擠？韻鏡把一類放在三等位置，其他兩類寄放在鄰近的三等或四等，謂之「寄韻」。寄韻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把祭、泰、夬、廢等去聲寄在陰聲韻的入聲位置，因為陰聲韻入聲無字，這些入聲欄裡面的字其實都是去聲；一種是三等字寄放在二、四等。後者是把三等韻中五音同類而實際上不同音位的聲母寄在鄰近的等，因為作者設計的同「轉」欄中二等或四等都沒有字，有字就表示是寄韻的三等字。說明如下：

(1) 去聲寄入

四聲不完全的韻母，如〈泰〉（一等去聲），〈夬〉（二等去聲），〈祭〉、〈廢〉（三等去聲）寄放在入聲位置，並註明「去聲寄此」。因為這四個「轉」是陰

聲韻，沒有入聲，入聲的空格正好可以容納這些韻母⁵的字。如果不用寄韻之法，將會增加四個「轉」而出現很多空音，顯然是不經濟的作法。這純粹只是編排上的問題，與音韻系統無關。

(2) 三等寄二、四

另一種是同為三等、同一發音方法的字有兩套以上的聲母時，把其中典型的三等字放在三等，其他的三等字寄放在鄰近的二等或四等。

編排上最複雜的是齒音。三等有二類齒音，《韻鏡》把章系字留在三等位置，莊系字寄放在二等，精系字寄放在四等位置。因此齒音必須選擇二、四等沒有字的「轉」才能寄放，否則就會衝突。《韻鏡》爲了提示二等有寄放莊系字的「轉」，其二等齒音是真三等字，而不是真正的二等字，在標題上都註明是「內轉」，其餘謂之「外轉」。讀者因此知道所有的「內轉」二等齒音都是假二等真三等的莊系字，而四等位置的字是假四等真三等的精系字。⁶

和莊系相平行的是舌音的知系。莊系和知系都只出現在二等和三等，但情形不大相同。舌音三等如果有兩類，知系字放在三等，端母字則寄放在四等位置。⁷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重紐」，指的是 10 個三等韻（支、脂、真、諄、祭、仙、宵、清、侵、鹽）的唇、牙、喉音各分爲二類，在《韻鏡》中一類留在三等位置，一類寄放在四等位置。「重紐」不只是編排問題，還牽涉到韻類分合的解釋，因此受到音韻學家的重視。

「重紐」的分別是什麼，自來就爭論不休，有認爲是來自上古元音的不同（如董同龢 1945、周法高 1945），有認爲是介音的不同（有坂秀世 1969、河野六郎 1939），後者的說法受到較多支持。

戰後學者傾向於主張重紐的介音是 *tj（三等）與 *j（寄四等）的差異（藤堂明保 1954、施向東 1983；1994、俞敏 1984、鄭張尚芳 1983；1987、龔

5 因為《韻鏡》開合分爲二圖，也就是二「轉」，因此二韻分寄在四個「轉」。

6 《韻鏡》「內轉第二十九開」收二等麻韻，似爲例外，但龍宇純校本註云「內當作外」，即外轉，非內轉，是傳抄錯誤，並非例外。

7 三等只有極少數的端母字，如內轉第六開〈至〉韻知母字「緻」放在三等，而端母字「地」則放在四等，內轉第二十九開〈麻〉韻四等收「爹」，三等空格，明示「爹」是端母字。

煌城 1997、丁邦新 1997)，其中以施向東（1983）根據玄奘梵漢對音、龔煌城（1997）根據與藏緬語的比較最有解釋力。

（三）前中古的介音系統

關於傳統韻書四等、開合的分別，高本漢（1915-1926; 1936）在中古音聲、韻母之間擬出兩個介音。依他的解釋，三等韻的介音是*j，合口韻的介音是*w，其餘是元音的區別。*j 及*w 的擬測得到漢語學界的贊同，現在已成定論。

李方桂（1980）又為二等韻擬出一個*r，並把來母由高本漢的*i 改擬為*r。他認為一等、二等的不同是*r 介音有無的差別，不是元音的不同，他的構擬得到大部分學者的贊同，並且得到很多延伸發展。

龔煌城（1997）進一步認為「重紐」也是*r 介音有無的差別，三等 A 擬為有*rj 介音，而三等 B 只有*j 介音。三等的*r 介音混同了不同元音引起「重紐」現象（詳參下文（五）「有關*r 介音」的討論）。在這個理論系統下，三等莊系、知系和重紐三等的介音是*rj，而三等精系、端系（寄四等）及重紐四等的介音是*j。我們採用這個理論，把介音是*rj 的叫做三等 A，把介音是*j 的叫做三等 B。

但李方桂（1980）和龔煌城（1997）的*r 介音是為上古音擬訂的，不是中古音。一般認為中古音已經沒有*r 介音了。問題是如果中古時代一開始*r 介音就已經消失，切韻音系的等第區別如何解釋？本研究認為至少在「前中古音」時期漢語*r 介音依然健在。由下文的分析可知，如果沒有*r 介音，所謂「五等韻」、26 聲母的假設就無法成立了。

一般的聲韻學家都按照傳統韻圖的習慣，採取所謂「開合」、「四等」的說法。如上所述，《韻鏡》等韻表雖然只有四格，因為五音中（不論重紐或舌音、齒音），三等都分為兩類，實際上有「五等」。現在依照這個分析及上述李方桂（1980）和龔煌城（1997）介音的擬測，將前中古音系的開合等第擬如表三。

表三 前中古音系的開合等第

	開	合
一等		-w-
二等	-r-	-rw-
三等 A	-rj-	-rjw-
三等 B	-j-	-jw-
四等	(-i-)	-w(i-)

表三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四等。一個語言有 /-j-/、/-i-/ 這麼接近的介音共存是很不自然的，既然三等已經有 *j 介音，如果四等真的有 /*i/，這個 *i 一定是韻母的一部分，不是介音。依此假設，一等和四等都沒有 *j 或 *r 介音，只有 *w 介音，其差別只在韻母是元音 i 開頭或非 i 開頭而已。

四等是否有介音是有爭論的。高本漢所擬四等有 *i 介音，有些學者則認為四等沒有介音，從梵漢對音來看，有無介音都有證據，丁邦新（2006）綜合各家，認為秦漢以前沒有介音，但六朝以後產生了介音 *i，因此切韻時代的四等應該有介音 *i。換言之，四等介音 *i 是後起的，類似近代二等牙喉音衍生介音 -i- 一樣。照丁邦新的看法，六朝時代已經新生介音 *i，開始和二等分韻了。但 i 介音全面擴散到大部分的漢語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至今粵語、閩語、客語白話音都沒有完全接受 i 介音。無論如何，我們把 *i 看成是韻母的一部分，不算是介音。

介音 *r、*j、*w 其實是聲母 (initial) 的一部分，所謂「介音」是由等韻的觀點說的。李方桂（1980: 24）討論複輔音時就說：「其實上面所說的介音 (*j、*w) 跟前面的聲母連起來也可以算是複輔音聲母。」

既然現代漢語聲韻學家把開合等第解釋為「介音」的區別，跟隨這個定義，本文所謂的「聲母」不包括「介音」。

「介音」關係重大，扮演著中古音聲、韻分化的關鍵角色，必須先討論。*j 比較單純，也沒有什麼爭議，留到第三節逐音討論，以下談 *w 及 *r 兩個介音。

（四）有關 *w 介音的檢討

《韻鏡》的合口韻自高本漢以來都解釋為有一個 *w 介音。據研究，古漢

語只有牙音有合口音，其他音的合口音都是後起的。如李方桂所說：「我們可說合口介音多半是受唇音及圓唇舌根音的影響而起的。」（李方桂 1980: 17）也就是說，部分中古音的合口介音是受到牙音 *k^w、*g^w 或唇音等具有 [+labial] 特徵的聲母的同化或類化而產生的。

輕唇音的認定是一個困擾而有爭議的問題。《韻鏡》本身並沒有標記重唇音或輕唇音，後人辨認非系，其實是根據三等合口當代方言唸唇齒塞擦音 f 或 v/w（與雙唇塞音對立）來認定的。但近代輕唇音的來源有兩類，一類在《韻鏡》標示著「合」，一類標示為「開」或「開合」，而輕唇化在現代方言的發展有所參差，對應關係頗為複雜。

1. 《韻鏡》「開」、「合」的標記

茲就《韻鏡》三等唇音相關的韻類，標示開、合的韻母，就現代方言的輕、重唇音讀進行檢討（以下所舉的韻類以平賅上、去、入，並標示個人的擬音，⁸ 例字於所謂「非、敷、奉、微各字母盡量各舉一常用字為例）：

表四 《韻鏡》合口韻

內轉第十合：微 (*jwai, 非、匪、肥、尾)、廢 (*jwai, 廢、吠)
 內轉第十二（開）合：⁹ 虞 (*jwou, 膚、敷、符、無)

-
- 8 《韻鏡》的韻母也可以進行內部構擬，當另俟他文，本文擬音與一般學者的擬音差不多，差異處是參考了更多的南方漢語方言和內部構擬的方法，如遇攝「模」韻，董同龢擬為-uo，而「魚」韻擬為-jo，一、三等韻腳不諧，但「模」韻粵語及閩南語漳州老派、潮州都念-ou，董同龢的擬音無法解釋方言的演化，因此我們參考閩、粵語音讀，把遇攝韻腳擬為-ou，「模」一等擬為-ou，「魚」三等則擬為-jou，「虞」三等合擬為-jwou。
- 9 《韻鏡》各轉標注的「開」、「合」可能有傳抄、改纂之誤，龍宇純校本多所校訂，本文根據其校訂本。有些開、合標注有明顯的錯誤，不在此一一討論。但有些轉標注「開合」，則不易了解。「內轉第十二開合」所謂「開合」的意思可能是本轉所收一等「模」韻屬開口韻（「模」韻粵語、漳州老派、潮州都念-ou，應該屬於開口韻），而「虞」韻屬合口韻，故本文歸入「合口」類，相對於「魚」韻在「內轉第十一開」，魚、虞兩韻是開、合對立關係；至於「內轉第二開合」所謂「開合」的意思則真不可解。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標注錯誤，應該是「開」，誤為「開合」；二是中古「東」、「冬」有開合之分，「東」是開口韻 (*ung)，歸入「內轉第一開」，「冬」是合口韻 (*wung?)，歸入「內轉第二開合」。從音理看來，第二個解釋不太可能，如果通攝一等有合口介音-u-和-wu-對立，其他攝也應該有這樣的對立，但是我們看不見平行的例子，何況如果「冬」韻為合口 (*wung?)，直接標注「合」即可，為何標注「開合」？「東」、

外轉第二十合：文 (*jwən, 分、芬、佛、物)

外轉第二十二合：元 (*jwan, 蕃、翻、飯、萬)

外轉第四十一合：凡 (*jwam, 法、汎、凡)

上表所有《韻鏡》標為「合」的字母，其唇音三等字（非、敷、奉、微四母）現代官話方言全部唸成輕唇音。

表五 《韻鏡》開口韻

內轉第一開：東_三 (*jung, 風、豐、鳳、目)

內轉第二開（合）：鍾 (*jung, 封、蜂、奉、冪)

內轉第三十一開：陽 (*jang, 方、芳、房、亡)

內轉第三十七開：尤 (*ju, 不、副、浮、謀)、幽 (*jəu, 彪、謬)¹⁰

標為「開」的字母的字，非、敷、奉三母現代官話方言也都唸成輕唇音，至於「幽」韻的唇音字「彪」沒有輕唇化，應該是韻母主要元音不是*-u-的關係；至於「微」母，除「內轉第三十一開」「陽」韻現代官話方言唇音全部輕唇化之外，其餘各韻都沒有輕唇化（如字例「目」、「冪」、「謀」、「謬」）。

可見問題出在開口韻。以下就《韻鏡》的開口韻探討有三個問題：

(1)《韻鏡》所謂「開」、「合」定義是什麼？有什麼音韻上的差異？

(2)主要元音-u 的三等開口韻和合口韻輕唇化有何不同？為什麼會不同？

(3)如三等合口是因為有個*-jw-介音促使唇音輕唇化，那麼「內轉第三十一開：陽 (*jang)」是開口韻，為何現代官話方言也輕唇化了？

2. 《韻鏡》「開」、「合」的定義

「冬」在上古屬於不同的韻部，是元音的不同，不是介音的不同，到中古音沒有理由變成介音的不同，因此我們認為中古音一等「東」、「冬」二韻，三等「東_三」、「鍾_三」二韻，應該都屬於開口韻，「內轉第二開合」的「開合」可能只表示主要元音為圓唇後元音的韻母，依本文的分析，仍屬於「開」，因此本表歸入「開口韻」。

10 必須聲明的是，以上的韻母擬音只代表《韻鏡》時代（唐末）的韻母區別，不是《廣韻》及其所本的《切韻》。通攝三等「東_三」、「鍾_三」都擬為*-jung，當時可能已經混同，或者差別極小，暫不作區別；流攝三等「尤」擬為*-ju，龔煌城（1997: 215）指出：「尤韻與幽韻應該有主要元音的不同，否則可合併為一韻。」幽、尤不同韻，韻鏡把幽韻放在四等可能只是借位而已，到現代方言唇音都還不輕唇化（如「彪」字音），顯然主要元音不是-u-，故擬為*-jəu。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所謂「開」、「合」的定義。李方桂（1980: 16）曾說：「在中古音系中我們把合口呼認為是介音 w 或 u，與介音 j 一樣看待……」，雖然在他的擬音 w 和 u 是對立的音位，但是對中古音 w 和 u 都一樣定義為「合口」。但《韻鏡》是這樣定義的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方言調查字表》（1981）把通攝的東、冬、鍾三韻，遇攝魚、虞兩韻都歸為「合口」，又把「內轉第三十一開」陽韻唇音字移到宕合三去，顯然修改了表五所示《韻鏡》的歸類。

但我們是把《韻鏡》視為漢語音韻史的文獻，認為它是代表唐末時代的一個音讀紀錄，其開合標記除了少數明顯的錯誤可以修正，我們相信作者的分類與標記基本上是正確的，不能根據後來的變化或甚至現代方言斷言其分類或標記有誤而任意修正。

如果斷言表五「開口」為「合口」之誤，那必須解釋下面兩個問題：(1) 合口比開口有標，根據意涵普遍性原理，有開口韻可以沒有合口韻，但有合口韻可以預期也有開口韻，為何遇攝和通攝只有合口韻，沒有開口韻？(2) 表五「開口韻」中通攝三等「東」、「冬」等韻「東_三」、「鍾」及流攝三等「尤」、「幽」的「微」母，現代方言都唸成 m-，沒有輕唇化。為何《韻鏡》合口韻的鼻音會輕唇化，而開口韻的鼻音不輕唇化？

我們認為把《韻鏡》的開口修正為合口，違反了「意涵相關性」的普遍原理。而且把 w 或 u 都視為合口呼，沒有看到唇音之後韻母合口化的結構擴散問題。

董同龢曾說：「《七音略》與《韻鏡》還在韻圖發展的初期。『開』、『合』……的觀念還不清楚，應用起來既有些不可解的地方，兩書又不一致，所以轉與轉之間的關係許多都成問題。四聲等子以後併轉為攝，這個問題就解決了，當時，如果我們膽大，更可以拿等子以後用得極一致的『開口』、『合口』與『獨韻』去矯正《韻鏡》的『開』、『合』與『開合』，以及《七音略》的『輕』與『重』。」（董同龢 1965: 128）不過還好，在他所擬的「韻鏡型的中古韻母系統」表，通攝不分開合，遇攝以魚為開、以虞為合，並沒有「大膽」修改。

我們認為，以後來的韻書修改《韻鏡》的開合標記是相當危險的。比如董同龢把有 w 或 u 的韻母都視為合口呼，因此把曾運乾 51 類聲母中的「不、

芳、符、武」在東_三、鍾、微、虞、廢、文、元、陽、尤、凡等 10 韻的唇音字母都歸非、敷、奉、微（董同龢 1965: 125）。即把表四和表五混在一起，忽略了表五的「微」母並未輕唇化的事實。這是不分 w 或 u，過度推論三等「合口」的字都輕唇化所產生的錯誤。

如前所述，古漢語只有牙音分開合，其他音的合口都是後起的。我們必須注意，任何音變都不是一夕之間完成的。三等唇音字的合口化以及輕唇化逐漸由北方向南方擴散，必須遵循「波傳論」的模式，由一個點向外擴散，因而呈現了以下的事實：

1. 結構擴散的差異：音變律在不同的結構中逐漸擴散，有些結構先變，有些結構後變（參見洪惟仁 2003 的論述）。
2. 音變律修改造成的差異：音變律在某些方言、某一個時期中止、修改，造成方言對應關係的複雜化。
3. 地理擴散的差異：音變律在不同的地理方言中逐漸擴散，有些方言先變，有些方言後變。其擴散必須遵循「波傳論」的模式。

3. 輕唇化音變的結構擴散與地理擴散

「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 是我在博士論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2003) 提出的概念，意即一個音變在詞彙上、地理方言上或社會方言上的擴散，會因結構的不同，變化速度有快慢的差別。它和「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 類似，但加上結構的限制，類似歷史語言學「條件音變」的條件限制。

唇音的合口化和輕唇化是漢語音變的一個潮流 (drift)，但其音變不是突變，所有漢語在一夕之間完成變化，而是由北而南、隨著音節內部結構的不同逐漸擴散。

我們認為《韻鏡》標示的開口、合口有實際的音韻區別。*w 和 *u 是不同的音位，《韻鏡》只把半元音 w 看成是介音，u 是韻核，不算介音，所以東_三、鍾、陽、尤、幽被認定為開口，有 *w 介音的才算合口韻。合口韻先輕唇化，有 *u 的開口韻到後期才輕唇化，並且後期的擴散不及於唇鼻音，這就是「結構擴散」的表現。

音變律可能中止、修改，造成方言對應關係的複雜化。舉官話與閩南語的一等合口韻類為例，作個比較：

外轉第十五開：泰 (*-ai，貝；帶、大；蔡……) 官話全開 (-ei、-ai、-a)；閩南語唇音合 (-ue)，其他音文開 (-ai)、白合 (-ua)。

外轉第十八合：魂 (*-wən，本、門；敦、尊、坤、溫……) 官話唇音開 (-ən)，其他合 (-uən)；閩南語全合 (-un)。

外轉第二十四合：桓 (*-uan，潘、盤；端、官、鑽、歡) 官話唇音開 (-an)，其他合 (-uan)；閩南語全合 (文-uan；白-uã)。

上面三個韻，就文讀音而言，唇音以外的音，閩南語和官話大體一致，問題在唇音。閩南語白話音三等唇音還保存重唇如「豐」(文 hong；白 phang)、「蜂」(文 hong；白 phang)、「芳」(文 hong；白 phang)。但一定唇音卻合口化了，如泰韻是開口韻，也唸合口。參考他韻的白話音，這個傾向更明顯，有些韻母，同韻其他音是開口，唯獨唇音為合口，如「糜」(文 bī；白 muē)、「被」(文 pī；白 phuē)，顯然閩南語唇音有同化韻母為合口韻的傾向。

相反的，官話在唇音之後都唸開口音，泰韻是開口韻，沒有合口化，但魂、桓兩韻是合口韻，唇音字也唸開口，顯示官話唇音和合口介音有共現限制：唇音之後不能出現合口介音。但這個限制可能是後來發生的，發生的時間必須在重唇輕唇化之後，否則輕唇化就不會發生。而唇音和合口介音的共現限制並沒有擴散到閩南語。

這個例子顯示，唇音後面的韻母合口化，在漢語方言地理上擴散的速度是不一致的，就一等韻而言，閩南語容易發生合口化(和《韻鏡》較一致)，但官話唇音之後卻傾向於唸開口。

唇音在三等韻的情形卻又是另一個局面。官話和閩南語文讀音，除鼻音之外，都唸輕唇音(閩南語*f->hu-)，顯示三等唇音的韻母事先已經合口化，變成撮口呼，才能變成輕唇音。

官話三等唇音傾向於合口化，一等唇音卻有合口化限制，可見音韻結構的不同造成相反的音變方向。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根據哪個方言修改《韻鏡》的開合口標記呢？

再以內轉第三十一開：陽韻的唇音為例。官話唸輕唇音，閩南語的文讀音唸 h-、客語的文讀音唸 f-，顯示是經過合口化而發生輕唇化。但白話音就不一樣了，閩南語「方」(文 hong；白 puī 漳/png 泉)，白話音是合口韻；但「放」(文 hòng；白 pàng)，白話音是開口韻。客語「放」(文 fòng；白 piòng)、「網」

(文 *mong* ; 白 *miong*)，白話音是開口(齊齒)韻，並沒有輕唇化。

顯示陽韻的唇音閩南語和客語白話層大部分沒有受到輕唇化潮流的影響。文讀音顯然是唐宋以後由北方移借來的。如果可以根據現代方言修改《韻鏡》的開合口標記，要根據文讀音還是白話音？

以上的例子證明，唇音後合口化，三等字進一步撮口化而輕唇化，雖然是漢語的一個潮流，但是這個音變規律不是一時完成的，在地理上的擴散有先有後，方言受到影響有快有慢或不接受擴散，呈現參差不齊的現象，而且不同的結構有不同的音變速度，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音變規則。

我們相信《韻鏡》的作者是根據一時一地的方言去標示開口、合口。後人當然也可以用自己一時一地的方言去修改標記，但不能以今律古，說《韻鏡》的作者標記「錯了」，或者根據現代方言修改《韻鏡》的開、合標記。

《韻鏡》沒有任何一個轉唇音有開、合口的對立，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切韻時代唇音尚未合口化。唇音後面的*w 是後代受到唇音聲母的同化衍生的新變化，三等合口又進一步輕唇化，這是第一波輕唇化運動。接著連*u 元音、甚至圓唇化了的後元音*a[p] (陽韻)的同化，三等開口唇音也合口化而輕唇化了，這是第二波輕唇化運動。

總結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前中古時期，唇音只有一套聲母，無開合對立，當然也無所謂非系和幫系的對立。

(五) 有關*r 介音的檢討

首先要認識，*r 不但是介音，也是聲母。*r 前面出現在其他的輔音時是介音，前面沒有任何輔音時是聲母。

李方桂(1980)和龔煌城(1997)認為*r 對中古音的韻母元音的分化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龔煌城 1997 就上古魚、陽兩部在中古的行為指出，魚部有*r 當介音時，字歸二等韻(如「格」*krak)；*r 當聲母時，字歸一等韻(如「落」*rak)，沒有*r 聲母當然也是一等韻(如「各」*kak)；陽部有*rj 作為介音時字歸梗攝三等 A (如「京」*krjang 字)，當*rj 前無聲母時，*r 變成聲母，字歸宕攝三等 B (如「涼」字)。¹¹ *r 介音是影響元音變化(如一

11 按此說二等韻、三等 B 都應該沒有〈來〉母，但二等韻有「冷」字(梗開二)、三等 A 有「鏐」字(幽韻)，龔煌城認為這是例外。

等轉二等，宕攝轉梗攝)的關鍵，深刻影響中古音後來的歸等、歸韻與歸攝。除此之外，*rj的假設又可以解釋中古重紐（參本文第一（二）2（2）「三等寄二、四」）。由此可見，三等 A*rj 介音的假設有很強的解釋力，本研究接受這個假設。

一般認為只有上古音才有複輔音，中古音沒有複輔音。我承認整體的傾向應該如此，不過正如上面討論唇音合口化時所說的，任何音變都不是一夕之間完成的。誰能斷言哪一個時期，複輔音突然消失，而變成中古音？李方桂為上古音所擬的*r 和詞頭*s-是同時在所有方言消失的嗎？既然*j、*w 到中古時期還健在，有何理由斷言*r 和*s-到中古在所有方言都已經完全消失了？

我同意到「前中古」時期，*s-可能真的已經消失了，但*r 肯定還健在的。因為，如果把*r 從表三「前中古音系的開合等第」表中取消，那麼一、二等或二、四等無法分別，三等 A、B 兩類不分，整個切韻系統都會亂掉。

我們承認*r 的消失是中古音的一個重要趨勢，但無法斷言*r 在前中古時期完全消失，如果完全消失，陸法言所參考的古今南北韻書的作者憑什麼分別等第與重紐？否定了*r 介音在前中古仍然健在的事實，將無法想像切韻音系會呈現著等第與重紐那麼清晰、精細的音類區別，甚至到了唐末《韻鏡》的作者整理切韻音系還可以歸納出那麼整齊的音韻系統。¹²

12 最早肯定中古音*rj 介音仍然健在的應該是丁邦新。丁邦新 (Ting 1975) 的博士論文認為魏晉時期二等韻仍有*r 介音，理由是魏晉詩可以押韻，但《切韻》的一二等韻有分別，表示當時元音韻尾相同，只有介音的差異 (p. 200, pp. 203-204)；但六朝已經消失，理由是二等獨立成韻了 (p. 258)；1997[2008: 79-85]的論文承認切韻時代的重紐是介音的區別，重紐三等（三等 A）介音都擬為有*rj 介音。換言之，到了隋代*r 介音仍然存在。但是他認為到了韻鏡時代*r 已完全消失。但我們質疑，如果《韻鏡》編纂的唐末*r 已完全消失，作者怎麼能夠那麼清楚的歸納《切韻》的等第（包括重紐）？與*r 介音平行的是*-d 韻尾。一般認為上古-d 韻尾到中古已經消失，但《切韻》〈序〉說「秦隴去聲為入」。丁邦新 (Ting 1975) 認為即使到了南北朝，*-d 仍然在某些去聲字保存著。何大安 (2009) 研究南北朝去入通押情形，認為到陳亡 (589) 時*-d 才消失。但統計南北朝去入通押情形不過 1.47-5.01%，非常少。這個研究顯示語音的消失不是突然的，而是經過漫長的擴散過程，不會在一個時點突然消失。我們相信即使到了《韻鏡》製作的唐末，雖然沒有*r 介音已經是漢字音的主流，但在某些周邊方言應該仍然殘存著*r 介音，作者應該是根據那些殘存的方言現象才能還原切韻時

總之，我們認為雖然*r介音的消失在中古以來是漢語的音變潮流（drift），但是這個音變不是一時間完成的，在地理方言上的擴散有先有後，有快有慢，呈現參差不齊的現象，有些方言白白脫落，有些方言把捲舌徵性轉嫁到聲母捲舌化或齒音化。如「知系」字，大部分的漢語方言都齒音化了，有些方言唸成舌葉音，有些方言唸成捲舌音，唯獨位在漢語周邊的閩語完整地保存著舌頭音唸法，和端系無別。顯示在閩語的音變史上，*r介音白白消失了，因而得以印證知系和端系的關係。

二、內部構擬的方法

《切韻》和《韻鏡》雖然善於運用音位的空音填補，呈現了整齊分明的音韻系統，但它的系統還不夠嚴整，而且韻圖畢竟不是拼音文字，只能呈現音類區別。聲母、韻母、聲調的音位系統及其實際音讀，必須經過歷史音韻學的「重建」（reconstruction），漢語或叫「構擬」、「擬測」。歷史語言學的古音重建有兩個主要的方法：

1. 比較構擬法（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2. 內部構擬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

比較構擬必須參核方言變異，擬訂可以解釋方言變異的古音系統；「內部構擬法」有兩個步驟，第一步利用對立、互補、自然類音等音位學的基本觀念，利用填補「空音」（“gap”或“hole in the pattern”）的方法，整理、歸納出一個音系結構；第二步為這個系統擬訂音讀。音值的擬訂雖然要根據當代方言以及文獻紀錄，但系統性的、細節的音讀擬訂不是採用比較現代方言變體的方法，也要參考語言普遍性、音韻的意涵性關係、音變過程的邏輯性，就各種可能的變體中決定合理的祖語（proto-language）形式。

（一）內部構擬法的空音填補

徐通鏘（1991: 204-205）指出高本漢是把內部構擬法引進漢語古音研究的第一人。高本漢利用幫、非互補，端、知互補，精、莊互補，群、匣互補

代的音韻區別。因此我們認為即使到唐末，*r介音和*-d還沒有完全消失。

的關係，互相填補空格（即空音），以考證上古音實為一套聲母。很可惜，高本漢不是用來構擬中古音，而是上古音。為何切韻音系的互補關係，不用來考訂中古音，卻用來考證上古音，在邏輯上不可解。

本文也是採用同樣的方法，考訂切韻音系的聲母系統，不過我們考訂的是「前中古音」，是中古音的源頭，不是上古音，也不是後來的演變。

既然我們把切韻音系看成是隋代陸法言歸納的「通變系統」，但通變系統是根據當代方言變異歸納出來的一個抽象的音韻系統，不是個別方言的音韻系統。

但它包含著所有個別方言保存著的古音區別，包括尚未參加音變潮流的方言，特別是未受中央主流方言影響的周邊方言，因此通變系統通常是反映這個語言更早期的音韻系統，比任何個別方言的音系更接近共同語（common language）或祖語（proto-language）。

通變系統一定比當代任何方言更複雜，如表一「閩南語央元音字類的音韻對應」分為四個字類，但當代閩南語沒有一個方言可以分得清四類音，泉州最多也只能分三類音，其餘的方言都合併為兩類。通變系統的四類音其實是反映了「漳泉閩南語」共同語的音韻系統。如果要把潮州、莆田也納進來，那個「大閩南語」的通變系統更複雜了。

但這些複雜性是表面現象，未經系統化歸納的通變系統不能直接用來擬訂共同語。檢視初步歸納的通變系統，將可能發現每一個韻類都有一些「空音」，透過空音填補的方法，認清通變系統的許多音類分別是不是真正的區別，才能歸納成嚴整、簡潔的音韻系統，其歸納的方法類似音位學。經過這種「空音填補」的操作所整理的音韻系統，不再是幾個方言的「通變系統」，而可能是更早期的一個「共同語」的音韻系統。這樣的系統是可以擬音的。¹³

總之，我們認為《切韻》或《韻鏡》是中古音初步歸納的通變系統，經過我們的內部構擬可以整理成一個可能代表中古方言的共同語。我們把那個

13 高本漢的歷史音韻學最受質疑的是直接就《切韻》的通變系統擬音，但切韻音系並不是一時一地的漢語方言紀錄，擬音有何意義？其次是沒有經過內部構擬的操作，系統龐雜，其中包含了許多後世的分化與混同。必須經過空音填補的操作，排除後世分化、混同與移借的「雜質」，所整理的音韻系統才可以看成是中古漢語的「祖語」。這樣的系統是可以擬音的。

時代叫做「前中古」(Pre-Middle Chinese)，「前中古」到底相當於歷史上哪個朝代不能說死。依照丁邦新(Ting 1975)的研究，兩漢仍屬於上古音時代，中古音從魏晉開始，那麼所謂「前中古」不妨定為魏晉時代(約第一世紀)。¹⁴「前中古」時代當然也有方言差異，方言的現象從魏晉時期的詩押韻情形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來，丁邦新(Ting 1975)第三章雖然把當時的詩韻歸為 37 類，這是當時詩韻的主流，但異類互押的情形仍然不少，譬如之、哈互押，幽、霄、豪互押反映了上古韻部關係，其他奇特的押韻，可能反映了方言或所謂韻緩的情形。因此我們所歸納的「前中古切韻音系」必須理解為經過理想化的(idealized)、一個當代主流方言的音韻系統。

(二) 避免「空音填補」的過度運用

《切韻》只是一種當代音韻紀錄的整理，其實不成「系統」，《韻鏡》才歸納為嚴整的音韻系統。不過系統雖然嚴密，仍然有許多空音，需要運用音位學的、內部構擬的方法重新分析，才能歸納為前中古的音韻系統。

但我們必須避免過度運用「空音填補」，把似可合併的兩類音位勉強合併為一類，必須適當解讀文獻顯示的事實，以免產生偏差。以下以章系和知系的「互補關係」為例加以說明。

《韻鏡》把章系列入齒音的範疇，即正齒音。但章系非常特殊，第一、章系字只出現在三等 B，其他的地方都是系統性空音(systematic gap)；其次、齒音精莊系與章系對立，是五音中唯一有兩套對立的音位，其餘四音都只有一套。

我們再看舌音，舌音二等、三等 A 是知系，一、四等及三等 B(寄放四等位置)是端系。但三等 B 只有「地」、「爹」等極少的字，其餘都是空音。一個音類涵字極少，一般而言可以看成是例外。¹⁵ 擬測古音必須把這些例外

14 魏晉是比較保守的看法。從韻母系統來看，切韻音系比丁邦新(1975)所歸納的魏晉韻母分韻更細，如魏晉時脂、微通押，真、欣通押，但《切韻》卻分韻，反映了更多上古音韻母的部類，可見切韻音系比魏晉詩韻更加存古。當然，切韻音系的分韻也反映了魏晉以後的創新演變，相當複雜。有關所謂「前古音」的韻母系統有待進一步進行內部構擬，請俟他文，此處不贅。以目前所知，筆者認為「切韻音系」反映的「前中古」時期也許可以上推到漢末。

15 例外音變的情形有很多種，第一種是極常用字，如北京的「的」tɿ 是本字「之」tɕi¹

先排除，才能梳理出整齊的音變規則。如果把「地」、「爹」等少數例外字排除，我們將發現齒音三等 B 的章系字，正好可以填補舌音三等 B 的空音位置，成互補分布關係。根據音位學原理，視為一套聲母。這樣一來不是可以解決前中古音齒音有兩套聲母的特異性嗎？

雖然《韻鏡》時代，章系被歸類為齒音，但一般認為章系在上古時期是舌音，這從章系字的諧聲字可以得到一點線索，如「專」（三等 B）是章母，但從專得聲的「團」是定母（一等），「傳」是澄母（三等 A），¹⁶ 上古音系把章系歸為舌音就是根據這類諧聲關係擬訂的。但漢字諧聲字是上古時代製作的，利用諧聲字考證中古音難免「以古律今」之譏；只顧音系表面的簡潔嚴整，不顧整體結構、歷史演變的實際也可能招致「削足適履」之譏，是危險的做法。

從切韻音系的結構看來，上述「古無章系正齒音」、「併章入舌」的假設運用到中古音系有兩個困難：

1. 章系字除了古舌音來源之外還有古牙音，如「枝」（章母）從支聲，但「技」（群母）是牙音，雖然這些字只是零星的變化，也顯示章系的來源不單純。也就是上古舌音三等和牙音三等的部分字到了中古混為章系。如果我們說章系就是舌音三等 B，必須說上古的 *kj 變成 *tj，跟 *tj 混同之後，再變成中古的齒音章母，這顯然是很迂迴的，還不如說上古有些零星的字 *kj 和 *tj 發生顎化，同時混同為齒音，形成中古的「章系」來得直接而自然。

2. 三等舌音聲母「端知系」包含四個聲紐，但「章系」聲母包含六個聲紐。我們可以說章、昌、船、日（章系）是由端、透、定、泥（端系）分化出來的，但齒音章系另有書、禪兩紐，如果說前四紐是由端知系四紐衍生而來，那書、禪是怎麼來的呢？這已經牽涉到上古更複雜的複聲母問題，必須解釋很多複雜的音變。¹⁷ 無論如何，六個紐塞不進四個舌音聲母的位置。

的白話音（例同「給」tei³白話音 kei³，「你」ni³本字「爾」ɲ³的白話字）；客語的知系都變成塞擦音，但「知」唸成 ti¹；英語的動詞不規則變化也一樣，都是因為常用字所以沒有跟著規則變。「地」的例外可以解釋因為常用字而保存古音。第二種是外來語或方言移借，如「爹」；第三種是新生語，如「丟」。這些例外都是有理由的。

16 高本漢、董同龢把章系的上古音擬為舌音，不過他們擬的是舌面塞音，和端系的舌尖塞音對立。李方桂（1980: 11）認為舌面塞音是因為舌尖塞音受到 *j 介音的影響而顎化的，因此章系上古音也應該擬為舌尖塞音。

17 李方桂（1980）認為上古不分牀（船）、禪，兩者可以都擬為 *dj。李方桂（1980: 88）

過度運用空音填補、削足適履，可能製造更多問題，並且弄得前中古和上古的音韻系統糾纏不清。因此「前中古」的音系還是把「章系」留在齒音比較乾脆，不必勉強把章系移動到舌音三等 B 位置，讓所有五音都整齊的，只有一套聲母。

(三) 音位學的歸納

如前所述，內部構擬首先要運用音位學的基本原理，了解一些自然類音之間的對立與互補關係，整理出簡潔的音韻系統。以下根據上面的論證，把《韻鏡》的四等改成五等，那麼四十二字母在開合等第的分布可以歸納如表六（表中（✓）表字數極少可能是例外或後起的存在）。

表六 四十二字母等第分布表

開合 等第 聲母		開口					合口				
		一	二	三 A	三 B	四	一	二	三 A	三 B	四
唇音	幫系	✓	✓	✓	✓	✓	(✓)				(✓)
	非系				✓					✓	
舌音	端系	✓			(✓)	✓	✓				✓
	知系		✓	✓				✓	✓		
半舌音	來母	✓	(✓)	✓	(✓)	✓			✓		
齒音	精系	✓			✓	✓	✓			✓	
	莊系		✓	✓				✓	✓		
	章系				✓					✓	
半齒音	日母				✓					✓	
牙音	見溪疑	✓	✓	✓	✓	✓	✓	✓	✓	✓	✓
	群母			✓	✓				✓	✓	
喉音	影曉	✓	✓	✓	✓	✓	✓	✓	✓	✓	✓
	匣母	✓	✓			✓	✓	✓			✓
	喻 _于			✓					✓		
	喻 _以				✓					✓	

又說審母是由上古*hrj-（如收、燒等字）變來的，也有來自*snrj（如恕、攝等字）的。無論如何，審母來源複雜，不能否認中古時期已經成為一個獨立聲母的事實。

如上表所示，《韻鏡》時代所認識的切韻音系，同一個發音部位有兩套聲母時大部分都是互補的，譬如知系與端系互補，精系與莊系互補，匣母與喻母互補，泥、娘、日三母互補……。表面上唯一衝突的只有幫系與非系三B，這是因為唇音合口介音的介入，經過我們的分析，也可以證明是互補的（詳參本文一（四）「有關*w 介音的檢討」及逐音討論三（一）節的說明）。請注意，表六是根據五等韻分析歸納的結果，如果是四等韻分析就看不出互補關係了。

照音位學原理，凡具有互補分布關係（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沒有對立（contrast）的自然類音（natural class）都可以歸為一類。內部構擬可以把切韻音系的聲母整理得很簡潔，無所謂 36 字母，也沒有 42 聲母之多。其音位清單及其音讀在下文中詳論。

（三）語音普遍性與古音構擬

運用音位學原理可以確定哪個音跟哪個音是對立的音位，哪些音是同位音，歸納出一個整齊、經濟的音位系統；運用音韻學原理及類型學意涵普遍性原理，其音讀也很容易擬定出來。

1. 意涵普遍性

Greenberg 一派的現代類型學家從世界各語言的統計研究發現了所謂的「意涵普遍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如每一個語言都有「黑」和「白」兩個顏色詞，假使一個語言有三個顏色詞，第三個顏色詞通常是「紅」。因此有「紅」色詞的語言，意含著也有「黑」和「白」。如果有五個顏色，通常是增加「綠」和「黃」兩個顏色詞。如果有六個顏色，再加上「藍」，如果有七個顏色，再加上「褐」（Berlin and Kay 1969）。每一個「有標性」（markedness）層次高的顏色詞的存在意含著這個語言擁有有標性層次較低的顏色詞，這種普遍性就是 Greenberg 所謂的「意涵普遍性」原則（Greenberg 1995），意涵層次所構成的鎖鍊關係，叫做「意涵普遍性鍊」（chain of implicational universals）（詳參洪惟仁 2003: 28 的介紹）。

根據這個原理，我們看到一個語言如果有「藍」的詞，也一定有「綠」和「黃」的詞，有「紅」的語言也一定有「黑」、「白」的詞；但不能反過來推論，因有「黑」、「白」詞的語言不一定有「紅」，有「綠」不一定有「藍」。

這個理論可以移用到音韻上。如果一個語言有鼻化元音，這個語言一定

也有口元音，但是不能反過來推論說有口元音的語言一定也有鼻化元音，因為鼻化元音的「有標性」(markedness)比口元音高；有濁聲母的語言一定有清聲母，但是有清聲母的不一定有濁聲母，因為濁音有標性比清音高。總之，我們可以從有標性層次高的音位推論有標性層次低的語言，但不能反過來推論。這就是「意涵普遍性原理」的運用。

表六顯示唇音雖後世分為兩套聲母，但因為這兩套唇音是互補的，根據音位學原理，可斷言切韻時代只有一套唇音。但所謂「唇音」的音讀理論上有許多可能，怎麼決定哪一套才是本來就有的，哪一套是衍生變化的？我們利用意涵普遍性原理做決定。

以唇音為例，重唇音幫、滂、並、明擬為雙唇塞音 *p、*ph、*b、*m；輕唇音非、敷、奉、微有人擬為唇塞擦音 *pf、*pʰ、*bv、*mv，也可能擬為唇擦音 *f、*fh、*v、*m̥。以上三組都是理論上可能的唇音，但哪一種才是切韻時代唯一的「唇音」呢？我們可以先做三種可能的假設：

假設 1：古音只有 *pf、*pʰ、*bv、*mv。*p、*ph、*b、*m；*f、*fh、*v、*ṽ 是後起的。

假設 2：古音只有 *f、*fh、*v、*ṽ。*p、*ph、*b、*m；*pf、*pʰ、*bv、*mv 是後起的。

假設 3：古音只有 *p、*ph、*b、*m。*f、*fh、*v、*ṽ；*pf、*pʰ、*bv、*mv 是後起的。

到底哪一組是正確的假設呢？我們必須判定只有假設 3 才是正確的。因為雙唇擦音是有標音，雙唇塞音才是無標音。無標音比有標音普遍，世界上絕大多數都有雙唇塞音 p、b，較少語言有雙唇擦音 f、v，雙唇塞擦音 pf、bv 更少，鼻化擦音 ṽ 更稀罕。如果一個語言有 f、v，通常也有 p、b，但有 p、b 的語言，不一定有 f、v。這就是「意涵普遍性原理」。

根據這個原理推論，如果中古漢語有唇擦音 f、fh、v、ṽ 或唇塞擦音 pf、pʰ、bv、mv 等有標音，一定至少有兩套唇音。既然前中古音只有一套唇音，那只能是 p、ph、b、m，沒有別的選擇。這是根據「意涵普遍性原理」必然的結論。

2. 關於濁音送氣問題

以下的擬音不一一討論濁音是否送氣的問題，高本漢（1936）、董同龢

(1954) 擬訂濁音爲送氣音，以爲可以解釋吳語濁音送氣及部分現代漢語濁音清化送氣的現象。但這個擬測與語言類型學發生衝突。

世界上的語言大部分都有濁音，卻很少有送氣濁音，可見送氣濁音是有標音，送氣濁音主要分布在印度半島，印度有送氣濁音，但是也有相對立的不送氣濁音；漢語吳語、老湘語有濁音聲母，但有些方言送氣，有些方言不送氣，並且送氣與否沒有辨義作用。送氣濁音是有標音，根據「意涵普遍性」原理，如果一個語言的聲母系統有送氣濁音，應該也有不送氣濁音與之對立。既然中古漢語只有一套濁音，我們擬測這套濁音是不送氣的。

即使前中古時期在語音的層次上，有部分方言把濁音唸成送氣，但在音韻的層次，其送氣成份也不必標記。正如英語的清音只有在 s 後面不送氣，其餘的環境都送氣，但是沒有人因爲英語大部分清音都送氣，而把所有清音都標記「送氣」(aspirated)，並且主張送氣音是基底形式 (underlying form)，不送氣音是表層形式 (surface form)。

因此不論站在音位學或語言類型學的立場，我們都不能假設中古以前的漢語只有送氣濁音，而沒有不送氣濁音。李方桂 (1980) 改擬爲不送氣音是正確的，從此得到大部分學者的同意，現在已經成爲共識了。

三、逐音討論

以下將按照發音部位及發音方法的不同，照《韻鏡》附錄「三十六字母」表的分法，將聲母分爲唇音、舌音、牙音、齒音、喉音，但將半舌歸舌音，半齒歸「齒音」，共五個聲母範疇，相當於傳統所謂的「五音」，分別歸納前中古時期的聲母系統，考訂其音讀，並說明後來演變爲 42 聲紐的過程。

(一) 唇音

古音學家一般都同意錢大昕所謂「古無輕唇音」之說。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只有「三十字母」，不分輕重唇（即只有不、芳、並、明四母），這表示至少在唐末以前，唇音輕唇化或許尚未開始，或者已經開始，但還不是主流。錢大昕 (1799) 卷 5「古無輕唇音」一節從廣韻及古切語幫系與非系不分的現象，斷言上古音及切韻音系都只有重唇音，沒有輕唇音。

表六顯示重唇音和輕唇音表面上是對立的，但上文（一（四）3 節）的

分析證明合口唇音是後來的演變，在前中古時期，所有唇音都只有開口呼，因此重唇音和輕唇音是互補的，唇音只有一套聲母。但這一套唇音的音讀應該是怎樣的呢？上文（詳二（二）1 節）討論「意涵普遍性」時已經分析，中古唇音有三種可能的假設，根據「意涵普遍性原理」，只能把唯一的唇音擬成雙唇塞音。即：

幫 *p、滂 *ph、並 *b、明 *m

前言一（四）節也已經詳論，古無合口唇音、古無輕唇音，輕唇音是後來的演變。漢語方言唇音合口化、輕唇化是一個潮流（drift），但在地理上的擴散有先有後，有快有慢，呈現參差不齊的現象，而且不同的結構有不同的音變速度，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音變規則。

如一（四）節所分析的，唇音聲母重唇音「輕唇化」的音變分為兩個時期，其音變規律不完全一樣。第一波輕唇化音變把《韻鏡》標記的三等合口唇音字全部輕唇化；第二波輕唇化音變是唇音聲母受到 *-u- 韻核的同化而輕唇化，但排除了鼻音聲母，推斷是因為鼻音前脫落了 *j 介音，逃過 *mju > *mjwu > *vu > fu……的輕唇化音變過程，直接走 *mju > *mu 的道路。

二（二）1 節已經說明非、敷、奉、微擬為唇塞擦音 *pf、*pʰ、*bv、*mv（假設 3），或擬為唇擦音 *f、*fʰ、*v、*ŋ（假設 2）。問題是，輕唇化之後，還保存著全清和次清之間的對立嗎？我們懷疑非、敷兩紐可能只是為了和重唇音滂、明對應，勉強湊成四個音，假設的存在。實際的音變也可能是 *pf、*pʰ 直接混同為 f；近代 *bv 變成 *v 再清化為 f，結果非、敷、奉完全混同，不一定要經過唇擦音 *f、*fʰ 的過程。極有標的音，即使曾經存在過，可以斷言在歷史上存續的時間一定極短暫，在地理上的分布也極有限。

（二）舌音

所謂的「舌音」包括舌頭音（端系）、舌上音（知系）及半舌音（來母）。錢大昕（1799）早已指出「古無舌頭、舌上之分」。¹⁸ 但這個現象，我們由其分布關係就可以證明。如表六所示，端系出現在一等、四等、三等 B，而知系出現在二等、三等 A，正好成互補分布關係，由此可見兩套舌音可以併

18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1799）卷 5「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節云：「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

爲一套音位。這一組音位可以叫做「端知系」。

那麼這個「端知系」的聲母，到底是什麼音？所謂「舌頭音」一般音韻學家都擬爲舌尖音，沒有異議；所謂「舌上音」的音讀有人擬爲舌面音，有人擬爲捲舌音。無論怎麼擬音，舌面音或捲舌音都是有標音，舌音最無標的仍然是如端系的舌尖塞音或舌尖鼻音。既然前中古音只有一套舌音，根據意涵普遍性原理，這套舌音只能是舌尖音。其音讀擬訂如下：

端*t、透*th、定*d、泥*n、來*r

表六顯示，舌上音只分布在二等（有*r介音）及三等A（有*rj介音），依照表三中古音系的開合等第的擬測，可見舌上音的分化條件是受到介音*r的同化。也就是說，舌上音的出現是可以預測的，因此可以斷定知系聲母是後來的演變。

捲舌塞音應該是比較自然的演變，可以擬爲早期中古音，現代漢語不少方言塞音發生摩擦化（spirantization），知系混入照系（章系或莊系），或讀爲捲舌塞擦音，或讀爲舌葉塞擦音，都是更後期的演變。

（三）齒音

所謂「齒音」包括「三十六字母表」的齒頭音（精系）、正齒音（照系），正齒音在切韻其實可細分爲二類，照_二謂之「莊系」、照_三謂之「章系」，還有半齒音（日母）。「齒音」實際上有三套聲母。不過我們把精系和照系合併爲「精莊系」，因爲莊系與精系兩者成互補分布關係。真正有對立的音位是「章系」，因爲三等B的位置同時出現了章系與精系。五音中唯一有兩套對立聲母的只有齒音。分述如下：

1. 精莊系

如表六所示，精系只出現在一、四等及三等B，莊系只出現在二等及三等A（寄二等位置），精系和莊系明顯地成互補分布關係，可見兩者是一套聲母的同位音。我們把這個音位叫做「精莊系」。

聲韻學家通常把精系擬爲舌尖音，而莊系擬爲舌葉音或捲舌音，既然精、莊不分，「精莊系」只有一套聲母，則其音讀如何？有3個可能的假設：

假設1：*ts、*tsh、*dz、*s、*z

假設2：*tʃ、*tʃh、*dʒ、*ʃ、*ʒ

假設3：*tʂ、*tʂh、*dʒ、*ʂ、*ʐ

舌葉音（假設 2）和捲舌音（假設 3）都是有標音，最無標的是舌尖音（假設 1）。根據意涵普遍性原理，我們只能假設「精莊系」的原始音讀應該是舌尖塞擦音或擦音（假設 1），其音讀擬為：

精*ts、清*tsh、從*dz、心*s、邪*z

依照表三對於中古介音的假設，二、三等 A（即莊系）都有一個*r 介音（包括*r、*rj）。

莊系（R4）和知系（R3）的分化條件一樣，其捲舌化過程完全平行，都是受到*r 介音的同化。由規律看來，莊系演變成捲舌音（如假設 3）比較自然，現代方言莊系舌葉音的變體（如假設 2）應該是更後起的演變。

2. 章系

查表六，章系只分布在三等 B，也就是出現在*j 介音的前面。因為精系字也可以出現在三等 B，因此章系和精莊系是對立的音位。既然前中古音精莊系擬為舌尖音，與之對立的「章系」聲母就不能是舌尖音。章系聲母的音讀有 3 種可能的假設：

假設 1：*tɕ、*tɕh、*dʒ、*ɕ、*ʒ

假設 2：*tʃ、*tʃh、*dʒ、*ʃ、*ʒ

假設 3：*tʂ、*tʂh、*dʒ、*ʂ、*ʒ

莊系聲母既已擬為捲舌音，章系即不能再擬為捲舌音（假設 3）。剩下兩個假設只是音值的差別，不是重要的區別。但若考慮到世界語言普遍性，應該採取假設 2 的舌葉音，如英語有兩個齒音的，就是採取舌尖與舌葉的對立。漢語方言舌面音通常用來標示舌根音的顎化，如*kⁱ> tɕi；*k^h> tɕ^hi；*hi>ɕi，與舌尖音對立的齒音通常是舌葉音。因此章系聲母的音讀擬訂如下：

章*tʃ、昌*tʃh、船*dʒ、書*ʃ、禪*ʒ

莊系與章系因為音值近似，容易混同。大概唐宋之間已經普遍發生，三十六字母的「照系」包含莊系與章系即反映了這個現象。混同之後的方言或讀成舌葉音（不妨稱為「莊歸章」），或讀成捲舌音（不妨稱為「章歸莊」），都是後來的演變。

（四）牙音

牙音最單純，如表六所示，見、溪、疑三母出現在所有的開合等第，唯群母只出現在三等 A、三等 B，在一、二、四等牙音的濁音位置都是空音。

這四個聲母最沒有問題，各家的擬音也最一致，本文亦擬爲：

見*k、溪*kh、群*g、疑*ŋ

現代漢語方言牙音在細音（三等、四等）及前元音（二等韻）之前往往發生顎化現象，有些方言甚至更進一步捲舌化了；而疑母也脫落了（如北京話）。這種變化越往北越嚴重，可見其擴散重心在北方。

（五）喉音

如表六所示，影、曉二母出現在所有的開合等第，與見、溪二母都是功能負荷（functional load）最高的聲母，能產性很高，涵字很多。

唯喻母只出現在三等，出現在三等 A 的別稱爲于母（或稱云母），出現在三等 B 的別稱爲以母（或稱喻母）。匣母出現在一、二、四等，正好跟于母、以母成互補分布關係。¹⁹ 依照音位學原理匣母、喻母可以併爲一個音位。這樣看來，喉音只有三個，喻母是多餘的了。三個喉音的音讀可以擬爲如下：

影*ʔ、曉*x、匣*ɣ

需要特別討論的是喻_四的性質。依表六，喻母和匣母互補，因之喻母可以歸匣母，中古音不需要設喻母。

這個結論對喻_三「于母」而言沒有問題，因爲于母的諧聲偏旁和匣母是相通的，兩者本來同源，雖然大部分于母是合口，但也有開口，開口音可以擬爲*ɣrj，合口音不妨擬爲*ɣrjw，不過既然我們把*-w, *-r, *-j 視爲介音，就沒有理由另立一個「于母」的音位。

但喻_四「以母」比較複雜，因爲以母有一部分字來自上古牙音（如「裕」字），一部分來自舌冠音（如「喻」字）。來源複雜，表示這個聲母曾經混同，情況和章系相似而相反。上文討論如何避免「空音填補」的過度運用（二（二）節）時已經警告過，研究共時音韻學，不能混淆了歷時變化。上古時代的分別如果到中古仍然還有分別，就要從其分別，不能強求合併，如果已經混同，那就必須合併。

本文把喻_四的底層形式擬爲/*ɣj/，並不表示其表層音值也必須唸成[*ɣj]。喻_四的表面音值大概很接近[*j]，和于母[*ɣrj]主要是介音的不同。但

19 匣紐和群紐也成互補分布關係，群紐一、二、四等空音，顯然是因爲到中古音，一、二、四等的*g 聲母混入匣母了。

[*j] 可以視為/*ɣj/的同位音。音值差異不影響音位歸納。儘管「以母」來源複雜，既然到了中古混同成*j 就不妨歸入匣母的三等 B。從音位學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古音系可以不必設喻母（包括「于母」和「以母」）。

喉音聲母後世的變化很大，影母/*ʔ/消失，變成無聲母。曉/*x/、匣*ɣ 在細音（四等）及前元音（二等）之前往往發生顎化現象，和牙音平行發展。又三等的于母和以母往往互相混同，且聲母脫落，唸成無聲母，唯一可以和影、喻分別的是聲調陰陽了。

四、結 論

《切韻》是中古漢字音的通變系統，《韻鏡》基本上是根據《切韻》所歸納的音韻系統。我們認為通變系統所反映的音系不是陸法言著作《切韻》的隋代，而是更早期的音韻系統，我們把這個時期叫做「前中古」。「前中古」的時代不能說定，至少在魏晉，甚至可以上推到漢末。

《韻鏡》的開合等第代表的是介音的不同，雖然《韻鏡》只有四格，但三等可分為二類，因此實際上有五等。《韻鏡》運用寄韻的方法把五等韻擠在四格裏。根據龔煌城等學者的證明，二類是介音*rj 與*j 的不同，本文稱有*rj 介音的為「三等 A」，有*j 介音的謂之「三等 B」。

本文根據這個介音系統的假設，歸納 42 聲母在開合五等的分布，發現「五音」相同的自然類音成互補分布關係，運用音位學原理，可以整理出前中古時期的聲母系統。我們發現五音中除了齒音有兩套對立的聲母之外，其餘各音都只有一套聲母。站在音位學的立場，從中古音的互補分布關係（如表六「四十二字母等第分布表」所示）就可以印證錢大昕「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的名論。

運用歷史語言學「空音填補」的內部構擬法，我們歸納切韻音系的聲母共 26 個音位；根據音韻的意涵普遍性原理為每一個音位進行擬音。前中古漢字音的聲母系統及其音讀擬訂如下：

前中古漢字音的聲母系統

唇音：幫*p、滂*p^h、並*b、明*m

舌音：端*t、透*th、定*d、泥*n、來*r

齒音：精*ts、清*tsh、從*dz、心*s、邪*z

正齒音：章*ʈʃ、昌*ʈʃ^h、船*dʒ、書*ʃ、禪*ʒ

牙音：見*k、溪*k^h、群*g、疑*ŋ

喉音：影*ʔ、曉*x、匣*ɣ

我們認為這個聲母清單 (inventory) 是「前中古」的聲母系統，是由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橋樑，上接上古，下開中古，並可以解釋中古以後的聲母演變，以至近、現代聲母的方言變異。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影印 1799 刊本。

龍宇純，《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

二、近人論著

丁邦新 1995 〈重建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6: 414-419，收入《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5-73。

丁邦新 1997 〈重紐的介音差異〉，《聲韻論叢》第 6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37-62，收入氏著，《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75-88。

丁邦新 2006 〈論《切韻》四等韻介音有無的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1.1(2007.9): 1-14。收入《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89-99。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981 《方言調查字表》，北京：商務印書館。

(日) 有坂秀世 1969 〈カー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説を評す〉，原連載於《音聲學協會會報》49、51、53、58 各期 (1937-1939)，收入氏著，《國語音韻史の研究》，東京：明世堂，頁 327-357。

何大安 2009 〈-d 的下限〉，收入氏著，《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臺北：作者自印，頁 239-247，原刊《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6，頁 477-490。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周祖謨 1966 《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俞敏 1984 〈等韻溯源〉，收入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音韻學研究》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402-413。

- 周法高 1945 〈廣韻重紐的研究〉，原刊《六同別錄》，又刊《史語所集刊》13(1948.9): 49-117。
- (日) 河野六郎 1939 〈朝鮮漢字音の一特質〉，《言語研究》3(1939.9): 27-53，收入氏著，《河野六郎著作集 2·中國音韻學論文集》，東京：平凡社，1979。
- 施向東 1983 〈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與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983.1: 27-48，收入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23-259。
- 施向東 1994 〈上古介音 r 與來紐〉，《音韻學研究》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240-251。
- 施向東 2013 〈悉曇學與等韻學關係再探〉，收入氏著，《古音研究存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頁 67-79。
- 洪惟仁 2003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徐通鏞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瑞典)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 1936 《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漢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陸志韋 1939 〈證廣韻五十一聲類〉，《燕京學報》25(1939.6): 1-58。
- 董同龢 1945 〈廣韻重紐試釋〉，原刊《六同別錄》，又刊《史語所集刊》13(1948.9): 1-20，收入丁邦新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頁 13-32。
- 董同龢 1954 《中國語音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 董同龢 1965 《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鄭張尚芳 1983 〈上古音構擬小議〉，《語言學論叢》第 14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36-49。
- 鄭張尚芳 1987 〈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1987.4: 67-90。
- (日) 藤堂明保 1954 〈中國語の史的音韻論〉，《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6 集，頁 1-24。
- (日) 藤堂明保 1979 《中國音韻論》，東京：光生館。
- 龔煌城 1997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 *tj-介音對中古韻母的影響〉，《聲韻論叢》第 6 輯，頁 195-243，收入《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 47)，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1，頁 127-163。

-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mbers, J. K. and P. Trudgill. 1998. *Dialectology*. 2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enberg, Joseph H. 1995. "The Diachronic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M. Shibatani and T. Bynon, eds.,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5-166.
- Karlgren, B. (高本漢). 1915-1926.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iden: Brill; Stockholm: P. A. Norstedt & Sons. 1930. 北京影印, 漢題《中華語音學研究》。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
- Weinreich, Uriel. 1954. "Is A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Possible?" *Word* 10: 388-400. Reprinted in J. Fishman, ed. 1968.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pp. 5-13.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 System of *Qieyun*

Ang Uijin*

Abstract

Qieyun 切韻 integrates Chinese dialects of the Six Dynasties era (about 3rd-6th centuries) into a diasystem, upon which the rhyme tables of *Yunjing* 韻鏡 are based. From these two sources, this paper internally reconstructs 26 initials of this diasystem, and then reconstructs their pronunciations according to the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principle. We argue that this inventory reflects the system of initials of Pre-Middle Chinese.

Keywords: *Qieyun* 切韻, *Yunjing* 韻鏡, diasystem,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Pre-Middle Chinese

* Ang Uijin is a retire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